

周恩来关心下一代情结

卞书樵

在周恩来心中,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、人民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。而对于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,下一代的健康成长,更在其革命生涯中时时铭记于心;关心关怀下一代的情结,充分展示了他崇高品格和人格魅力。

不怕牺牲,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,搞好民主改革,党中央相信你们。”周总理的指示,给了年轻的藏族学员们极大的激励和鼓舞。

鼓励政治进步

抗战时期,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,无学可求。为鼓励青年政治进步,1937年12月,周恩来根据抗战形势,专门向青年人阐述了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,认为“敌人要我们每个人、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。我们要求生路,便只有抗战,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”;“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,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”,“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,锻炼得强健起来”。“我们青年不仅仅有今天,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。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,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,他的后代。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,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;而且要问,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,怎样改造中国,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、民主的、共和的国家”。“我们中国的青年,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,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”。

1957年3月,周恩来在杭州作报告,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人说:“我们革命的目的,就是要使人民得到幸福。”“从鸦片战争以来,我们前辈革命的人,前仆后继,流血牺牲,为的就是后代的幸福。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,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,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,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。我们现在也应该想一想,怎样为我们的后代谋幸福,为我们民族谋长远的幸福。回想过去,我们是艰苦奋斗、流血牺牲中过来的。我们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,不仅是近百年,而且从有历史记载以来,几千年间,劳动人民不断斗争,形成了一种艰苦奋斗、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。我们应该继承这种传统,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”。1965年3月,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时,谆谆教导我国的留学生,“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”,既“要学好专业知识,还要学好政治,做到又红又专”。“有一种‘红而不专’的倾向,这是不对的”;“但是,‘专而不红’也是不对的,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,要站稳立场”。

1959年3月,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悍然发动叛乱。在这个关键时刻,党中央作出了在西藏平息叛乱、进行民主改革的英明决策。中央民族学院的数百名藏族学员,响应党中央的号召,纷纷请战,希望组织批准返回西藏等地参加民主改革。8月10日,周总理亲切接见准备赴藏的同学,并作极为重要指示:“你们回到西藏以后,要充分发动群众,和广大藏族人民、解放军指战员紧密地团结起来,共同战斗,彻底平息一小撮反动农奴主阶级分子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。在斗争中要勇敢战斗,

要求不搞特殊

北京101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。1953年5月,周总理在视察北京101中学并与学生对话时说,“党和人民政府是很关心你们的”,“主要就是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,不要脱离劳动,不要脱离群众,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,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,立过功,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账上”。“你们的父兄是从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,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,你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”。“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,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。你们如果特殊化,脱离了群众,人民是不会答应的”。“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,不能骄傲,要谦虚,要尊敬老师,要向劳动人民学习,向劳动人民多作贡献。如果说要特殊,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”。同时,他告诫学生们,当年清朝八旗子弟的祖先都是“清朝立有功战的开国功臣,自小骑马射箭,能征善战,以后带兵灭了明朝,建立起清帝国,可是到了八旗子弟就不行了。他们从小娇生惯养,不骑马,要坐轿,整天提着鸟笼东游西逛,游手好闲,坐吃俸禄,不劳而获,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,甚至成了一群大烟鬼。后来,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,他们束手无策,一败涂地,屈膝投降。当然,“无产阶级的后代,那完全是另一回事”,“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,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。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什么,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。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,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”。

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周家下一代的要求,曾经列了“十条家规”,包括: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,不要别人代劳,自我服务;生活要艰苦朴素;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,不要炫耀自己;不谋私利,不搞特殊化等等。周秉宜是周总理的侄女,自小跟随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,前后近20年。周秉宜说,“周家的规矩的确很多”,“从记事开始,诸如‘你们小孩子没有为人民做出贡献,没有资格坐公家的车’之类的教诲不绝于耳”。“每年年底,总理总要召集家人一起听他讲讲话,我的那些个堂哥一个个全程双手垂立,站有站相,这不是一时半刻做出来的样子,而是多年耳濡目染养成的习惯。即便如此,总理依然跟我们强调说:我们周家是一



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,封建家庭有很多坏东西,贪污、讲排场等等,我小时候都见过,所以我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,投身无产阶级,走一条革命的道路”。总理的教育在我们心底刻下了印记,他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个普通百姓,周家人打小就没有所谓干部子弟的优越感,从来就没有。”

关心儿童成长

周恩来一生没有亲生子女,但他把革命后代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,关心爱护无微不至。罗西北的父亲罗亦农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,因叛徒出卖,遭到逮捕杀害,母亲也因落水不幸身亡,2岁的罗西北成了孤儿。在周恩来关怀下,罗西北成为首批到达延安的孩子,后来,又与其他几个孩子被一同送往苏联学习。从那以后,罗西北始终牢记周恩来的教诲,干一行爱一行,后又扎根水电系统,先后参加了龙溪河、大洪河等河流规划和水电站的初步设计;组织领导了黄河上游、乌江、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考察和规划选点工作,成为新中国动能经济和水能规划方面的知名专家。而对陈祖涛的关爱,则更显示出周恩来的高风亮节。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是原红四方面军政委,在红军长征途中,曾一度追随张国焘错误路线,有几次还同周恩来闹翻了脸。为了顾全大局,周恩来等红军领导反复做陈昌浩的工作,从而促使红四方面军摆脱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,北上抗日。1938年的一天,在周恩来的关心下,年仅10岁的陈祖涛被送到延安,见到了自己的父亲陈昌浩。1939年夏,周恩来赴苏联养伤。临行前,他仍然没忘记陈祖涛,在征得毛主席同意后,带陈祖涛

去了苏联,并把他送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在周恩来的关心培育下,陈祖涛成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。

周恩来对外国友人子女的关注同样感人至深。弯威(中文名常怀)和西林(中文名常媛)是一对来自泰国小兄妹。其父亲是时任泰国总理的首席顾问和密友,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中泰两国友好作出过重要贡献。后来,泰中关系受到亲美反华派的阻挠,泰国总理决定派代表到中国生活和学,做两国间的友好使者。1956

年8月,12岁的常怀作为泰国政府总理的私人代表,8岁的常媛作为他的陪伴来到北京。对作为友好使者的泰国小兄妹,周总理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周总理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一座三进四合院,还为他们配备了翻译、厨师和司机。中秋节,周总理还把兄妹两人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做客;后来,又请负责外事工作的廖承志照顾他们兄妹。1957年,泰国发动政变,兄妹俩的父亲被捕,但周总理仍向震怒不已的小兄妹表达说:“我们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保护你们,让你们在中国安定生活、学习、成长”后来,一名英国留学生追求常媛。当常媛后来想跟这名英国留学生回国时,由于原来是秘密入境,没有护照,周总理便亲自给英国使馆写信,证明她的身份,帮助她顺利前往英国。

重视学习生活

周恩来在访问罗马尼亚时,与中国的留学生谈起了学习外语的方法,说“要学好外语,一定要多讲,脸皮要厚,要敢说。要同外国朋友生活在一起,多同他们接触,多同他们直接交谈。在罗马尼亚学习,就要多同罗马尼亚同志讲罗马语,否则,你们学到的,就不是地道的罗马尼亚语,而是中国味道的罗马尼亚语了”。同时又强调,“要注意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”,“不少人是中学刚毕业就来国外留学的,科学知识还很贫乏,必须在学好语文的同时,注意扩大知识面,学些地理、历史等方面的常识,掌握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”。对于学习的目的,周总理告诫留学生,“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同学,要做到学以致用,使自己学成以后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

献”;“人家好的东西,我们要学到手,用来为祖国的建设服务。我们到这里来学习,不是为了要什么毕业文凭,而是要把知识学到手,用在祖国的建设上”。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,还要求学习外语“不光是掌握外语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,做好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五个字,还要懂得历史和地理。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”。1957年3月,在欢送出国留学生的晚会上,周恩来又要求出国留学生“吸取外国的长处为我所用”。他说,“十九世纪末,我们先后派人到日本和欧美去留学。当时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从西方或日本吸收了一些科学知识,使我们民族学到了一些当时需要的东西”。“我们派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,就是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知识”,“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知识,回来为祖国服务”,“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,不要读死书,要活用”;同时,“必须遵守所在国的纪律,决不允许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”,“中国同学在学习中要有纪律,应订立公约,互相约束,大家遵守,养成纪律性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周恩来在杭州人民大会堂作报告。在谈到学生学习的目的时,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生说:“现在的中学生,进学校是为了什么?受过教育以后去做什么?进中学的每个人不可能将来都升大学做大学生,都当高级知识分子,或者当国家干部”,“更多的人毕业后要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不论能不能升学,不论干什么,目的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。这是你们学习的目的,也是国家办教育的目的”。“工厂里的劳动者也需要受过中等教育。不仅现在还在学校学习的青年要认识到这一点,就是已经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,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”;“不仅工业有这样的要求,农业也是一样。农民也需要有文化”。“我们青年一代的农民应该有文化。有了文化,不仅今天可以掌握已有的技术,增加生产,而且将来能够运用更新的技术,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、现代化的问题”。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懂得劳动的可贵,要热爱劳动,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旧社会有句老话,说‘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’。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官,这种观点是违反时代潮流的,是错误的,我们应该否定它。我们应该认识到,学习是为了劳动,为了社会主义建设”。“青年人学习告一段落,就要到劳动岗位上去,到农村和城市的各种劳动岗位上去”,“就业的范围很广,在厂矿企业、学校、机关里工作是就业,在农村的合作社、手工业合作社、各种商业机构里工作也是就业”。

周恩来对下一代的关心情不胜枚举,如涓涓溪流,滋润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。周恩来精神对于下一代是信仰也是激励,对于下一代的关心,时至今日,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,指导着人们在前行道路上不断传承和弘扬。

地方神勇游击队

刘崇实



抗日战争时期,我地方民主政权石塘区有一支神勇游击队,为首的是区长顾津(号以谨)和大队长孙亦贵,他们打得日本鬼子和伪军整天缩在石塘和马甸圩子里,偶尔出来扫荡抢掠一次,也慌慌张张地如同惊弓之鸟。

顾以谨是朱桥河南顾庄人,原淮安九中的学生,在学校秘密加入地下党组织。抗战爆发后出任我石塘区区长,当时石塘区区域大到整个涟水以南的整个淮东地带,群众都亲热地称呼顾以谨为顾大区长。他动员弟弟顾以赞、顾以高、顾以禄和侄儿顾文藻一起参加游击队,并倾尽比较殷实的家底,为队伍购买枪支弹药,连他家里一棵两人合抱粗的大枣树都锯掉送给新四军制造手榴弹,不准家里收地租。他在群众中声望很高,可谓文武双全,大智大勇。他宣传抗日,组建地方武装,为新四军输送兵员和给养很有办法。老百姓全听他的,信赖他心中藏兵无数的英雄气概。一次他在群众家草屋内看文件,突然看门口的老大妈跑进来说有鬼子进了庄,顾以谨淡淡一笑说:大妈,您别慌,照原样坐在门口摘萝卜。您要慌,鬼子就起疑心,全庄

人都要遭殃!他镇定自若地收拾好文件,掀起后屋檐跃身而出。离开庄子300米后,他“砰!砰!”地打来两枪,鬼子和伪军不知道庄外有多少游击队员,害怕自己进村被包围,掉转头直往圩子里跑。因为他患夜盲症,夜晚办事尤为谨慎,在成湾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,他提前离开成湾一步,而免遭杀害。

游击队大队长孙亦贵也是朱桥河南孙杨村人。他身材高大,能端起机枪边打边跑。一次,他在日伪和根据地两势力交界处活动,发现大批敌人又出来扫荡。他马上叫村干部组织群众转移,情急之下,为保护群众,他单枪走险,沿着马王沟坡,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三个方位,发了三枪。三枪打死三个鬼子。敌人吓坏了,不知前面有多少伏兵,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,只好掉头撤退。孙亦贵的神勇在群众中传开了。大家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赞颂他:“孙亦贵,飞毛腿,跨步就是二里;孙亦贵,神枪手,三枪打死三个鬼。”又有一次,十几个鬼子追赶他一个人。他的子弹用完了,又被逼到河边,敌人以为他再也跑不了。当时涧河通航,水面比较宽。据

说孙亦贵从稻草堆上扯下两捆草往河心一撂,飞步河心草捆,就跨过河去。他大声地嘲笑鬼子说,谁敢过来?敌人被他的神勇惊呆了,怎么也不敢趟水过河。车桥战役韩庄阻击战有地方石塘区的游击队配合作战,孙亦贵飞渡涧河捉拿一个日本鬼子,此鬼子因愿意投降被放回,把孙亦贵一步跨越涧河的故事讲得神乎其神。从此日本鬼子都知道,共军有个孙亦贵,天神爷爷不能得罪!孙亦贵曾被淮安县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,奖励一支日造手枪。地方还有民谣颂颂孙亦贵:“石塘有个韩大队(伪军大队长),朱桥有个孙亦贵(我游击队大队长),两人死作对,一个是害民的地头蛇(指韩大队),一个是除害人的英雄辈(指孙亦贵),两人一见面,姓韩的必定是孙大队的枪下鬼。”后来果真应此言。

游击队副队长顾文藻胆大心细,以计谋多出名。有一天夜里8个伪军在蒋庄高家打麻将,高家深宅大院,还有2个人轮流在门口放哨,他们认为十分安全。顾文藻因为对地方情况熟悉,马上想出一条妙计来捉这几个伪军。庄上有个穷苦小混混,是这户高家的侄孙,他就装成这个小混混,跑到高家锅屋的窗口口喊正在烧夜饭的高老爹:“老爹,老爹,我帮您烧烧火吧!又冷又饿啊!”高老爹一个人忙上忙下,正缺少一个帮手,虽然骂了他几句,还是开后门放他进来。顾文藻进门未待高老爹缓过神来,就干掉那个打瞌睡的堂屋前哨岗,冲到堂屋里大声喊道“不许动,举起手来!我腰上绑的全是手榴弹,谁敢动一动,叫你们一窝老鼠上西天!”敌人一看他腰里的手榴弹,知道不可抗拒,谁也不敢动,任凭他摆布。顾文藻用枪点着他们,一个接着一个用绳子相捆绑。他绑个尾巴,再用一根绳子串联起来,像牲口一样把这几个伪军赶到游击队宿营地,根据各个伪军的态度,分别按政策办事。从此,顾文藻声名大震,吓得敌人夜里睡觉都怕,更不敢上茅坑。

周恩来是我党最早密码的发明者

戴镜元

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同志发明的,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。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,内容是问任弼时是否到了中央苏区。周恩来有重要事情不在时,就由邓颖超译电。任弼时有紧急事情不在时,陈琼英负责译电。第二份电报,是关于商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。以后“豪密”逐渐用于全军全党的联络,主要内容都用豪密,因为最早编制这套密码的人叫伍豪,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。

1947年秋天,周恩来同志在陕北神泉堡召开了一次机要工作会议。研究讨论机要、保密、密码通信工作。密码方针,保密制度,工作纪律,都是要保证全军机要密码工作绝对安全。我军保密工作,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。

当时,周恩来对中央军委二局工作作了重要指示。

第一,现在是统一领导,分散经营,准备在两年以后,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。这是一个科学的预见。1946年是战略防御,战术进攻。现在是战略进攻。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,发展解放区。

第二,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和

革命精神相结合,有无限的发展前途,无往而不胜。我们党的机要工作,科学技术工作正50分,我们的政治是正义的,是有无限生命力的,也是正50分,两者相加得正100分。敌人的科学技术也是正50分,但他在政治上是腐化的,没落的,没有前途的,是负50分,正负相加等于零。所以我们一定胜利,敌人一定失败。

共产党掌握了技术,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所有的技术,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我们的胜利之首,就是技术+政治,我们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,就不可能战胜敌人。周恩来对政治非常重视。

1948年3月12日,周恩来同志在中革军委二局一个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:“这一次报告写得很好,有内容、有分析、有批评、有方针,这是你们局的工作上升一步的积极表现。以科学战胜科学,应该加上政治,就是我们掌握了科学,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使用的科学。”

“豪密”是我党建立机要工作的最好的,而且是保密性很强的一种密码。

